

文学研究会 小说选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会小说选(共两册)

Wenxue Yanjiuhui Xiaoshuo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1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frac{1}{8}$ 插页 2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50

ISBN 7-02-001127-6/I·1053 定价 10.40 元

I247.5
4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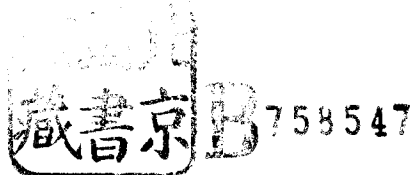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文学研究会
小说选
下

李葆琰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前 言

李 葆 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社团曾经起到重要作用。文学思潮的涌现、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论争的进行、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开展，几乎都是通过文学社团的活动实现的。现代文学社团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文学史上亦属罕见。茅盾在三十年代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列举的一九二一——二五年间各地出现的文学社团就有一百余种，他并且说这个统计很不完全，实际数目“也许还要多上一倍”。近年来有人收集到六百多个现代文学社团的名单，也还不能说已经包罗无遗了。

五四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两千多年来长期禁锢着中国人民精神的封建思想道德，受到猛烈的冲击，中国人民的思想水平一下跃进了几百年——跨越了欧洲人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历史行程。进入了新时代。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开始了现代历史新时期。但是，“五四”并未触动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国仍然被反动军阀统治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日益加剧。

在文学方面，“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有的消沉转向，有的出国游历留学，也有的投身社会革命活动，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了，解体了。坚持新文学的只剩下少数人了，一度轰轰烈烈的新文坛顿时冷落下来，呈现出“古战场”一样的“寂寞荒凉”。而封建的、殖民地化的“鸳鸯蝴蝶派”一类小说，却由文言改用白话，并且在内容上模仿新文学作品，也去写劳工、妇女、家庭等等问题，披上时髦的外衣，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大肆泛滥起来。言情、黑幕、“社会”、香艳……五花八门的杂志、小报、画报、长短篇出版物，如同丛生的杂草一样，在“娱乐”、“消闲”的幌子下面，散发腐朽的思想毒素，污染着、销蚀着人们的精神。“国粹派”也在惊魂甫定之后，蠢蠢欲动，刚刚诞生不久的新文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经过“五四”洗礼的新文学战士和文学青年，发扬“文学革命”时期集团战斗的精神，组成众多的社团。社团活动贯彻三十年现代文学史的全过程。这些文学社团，为巩固新文学阵地，扩大新文学成果，推动新文学发展，努力奋斗，创造出光辉的中国现代文学。

茅盾曾经这样评价早期新文学社团的功绩：

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这段话用来评述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文学社团，也是很恰当的。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新文学团

体。在它之前,《新青年》社、《新潮》社等都为文学革命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它们都不是全力从事文学活动的,说它们是新思想团体,更符合实际。

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

文学研究会是会员最多、阵容最强大的新文学社团。成立之初有二十余人,到一九二八年最后一个正式登记的会员已经是第一七二号了。除北京、上海外,广州等地还成立了分会。

文学研究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宏大的规模,有周作人等威望甚高的发起人^①、有《小说月报》这样第一流的大型刊物作阵地,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出现适应了新文学发展的需要,适应了广大作家和文学青年的要求。文学研究会几乎囊括了那一时期所有的新文学作家,后来成为新月派主将的徐志摩、象征派的两位代表诗人李金发与戴望舒、以及语丝派的不少骨干,都是文学研究会正式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张闻天、陈毅(曲秋)、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等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

鲁迅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因为他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金事,按照北洋政府所谓“文官法”的规定,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但是,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十分密切。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跟文学研究会一致;《文学研究会宣言》发表之前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是《小说月报》审稿人之

^① 周作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并未起什么作用,发表在《小说月报》等会内刊物上的作品也很少,实际上他很快就脱离了文学研究会的活动。

一^①；鲁迅是文学研究会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及许多翻译作品都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面；鲁迅对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多次在书信中与沈雁冰等人讨论会内的工作。可见，鲁迅是文学研究会的热情支持者，我们可以称他是文学研究会编外的“骨干成员”。

郭沫若也不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并非一开始郭沫若就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据他在《创造十年》里说，郑振铎曾写信邀请他和田汉同作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由于田汉没及时把信转给他，也就无从考虑是否加入了。当然，郭沫若未入文学研究会也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事实上，半年以后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成了第二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又未尝不是现代文学的幸事。

文学研究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成立之初制订的“简章”所规定的“每月开常会一次”、每年选举干部等等，实际并没有执行。它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刊物、丛书的编辑出版来开展的。因此，以至造成了文学研究会这样一个大社团，有成立之日却无准确的解散之期这样的难题。由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第十二卷第一号起）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刊物（常被人们称为“机关刊”或“代机关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人们一般便把《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第一号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的一九三二年一月，确定为文学研究会的终止时间。虽然后来商务印书馆还陆续出过多种“文学研究会丛书”，但都是作家们（有些并非文学研究会成员）以前作品的结集或再版重印，只能看作文学

^① 参见沈雁冰：《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

研究活动的余绪罢了。文学研究会整整活动了十一个年头，是现代文学史上寿命最长的社团。

文学研究会所办刊物，除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外，还有《文学周报》、《诗》月刊等，还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小说月报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等共二百余种^①。通过这些刊物和丛书，文学研究会团结、联络了广大会内外作家，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翻译、理论作品，特别是创作，其中有不少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茅盾、巴金、老舍^②、丁玲等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首先刊登在《小说月报》上面。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新文学园地，扶植了文学新人的成长。

文学研究会取得了巨大的、多方面的成就。理论、翻译、小说、新诗、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有文学研究会成员辛勤耕耘，并获得丰硕成果，其中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活跃在文坛上，有的作家至今仍然笔耕不辍。

文学研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流派。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论述到法国浪漫派文学的诞生时，这样写道：

既然反动的压迫产生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那么最美好社会的

① 参见《文学研究会资料》，贾植芳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② 老舍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初期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他的优秀短篇小说都写在1932年以后，本书未收入。

文化教养就给非政治性的文学在感情领域和思想领域两方面开辟了自由驰骋的用武之地，别的什么也不要求，只要求形式的精美和完善。于是，文学就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使一次新的文化创作运动摆脱束缚，起程飞跃了^①。

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与法国浪漫派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却走了另一条道路。

中国的现代作家，虽然因为受到腐朽反动的军阀的统治，从而强烈地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而且“五四”前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文艺理论的介绍与传播，也为文艺的自由发展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些作家都是社会变革的拥护者和参与者，不少人的从事文学也跟当年的鲁迅持同一态度——目的是以文学“改良这人生”；因此，要他们象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回避现实，去歌颂历史英雄人物、描写异国情调、吟咏自然风光，即使也具有反抗社会的意义，他们也是做不到的。中国新文学面对的是腐朽的军阀专制、“瞒和骗”的封建旧文学和商品化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就决定了它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旧道德、旧文化，建设崭新的时代文学的充满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特点；而以文学服务于社会改造的鲜明目的性，又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是“超功利”、“非政治”的“纯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经过一场“五四”风暴，人们好象在酣梦中被唤醒了，睁开眼看看人世间，发现那么多的缺陷、那么多的不平、那么多的黑暗，觉悟到过去“全是发昏”。对现实的极端不满，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成为一个巨大的深入人心的社会思潮，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为人生”文学思潮广泛而深刻的影

^①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

响^①。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现实,进而改造社会现实,对文学持崇高严肃的态度,是新文学者一致的出发点。

创造社虽然注重主观抒情,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其特色,还非常强调文学的“自由”,甚至提出“除去一切功利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以至有人因此而把创造社称为“为艺术的艺术派”;但是,创造社作家深受“为人生”思潮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认识到文学负有“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反抗藩篱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②,他们的诗歌、小说、新编历史剧等等,也都蕴含着生动的人生内容。所以,可以把创造社看作“为人生”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尽管在文艺思想方面、特别是创作方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新文学运动的这两大方面军,在反对封建旧文学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它们跟后来出现的众多新文学团体、流派一起,创造出了绚丽辉煌的新文学。文学艺术本来应当是丰富多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在一个时期里,只有一种颜色、一个调子,那就是贫乏、枯燥、毫无生气,就是文学艺术的不幸。

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就在“宣言”中郑重申明自己的态度:

① 文学要反映现实、表现人生,是新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便强调这一点,而且始终坚持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提出“人的文学”、“人生的艺术派”、“为人生的文学”等概念。于是“为人生”成为这一思潮的公认的称号。“为人生”既是对旧文学的否定,也是跟“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相对立的观点。

② 见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与《文艺之社会使命》。见《创造社资料》。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文学研究会作家主张，文学的目的是“表现人生”^①，文学应该“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②，而处在“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声”的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乃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③。

文学研究会作家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会内的主要理论家沈雁冰指出，文学只有以“艺术的手段”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情感，才算是表现了人生，才可称得是“人的文学——真的文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独立创造”，如果一味模仿，势必使文学作品表现得不充分，缺少“活气和个性”^④。郑振铎在反对“娱乐派文学观”的同时，也反对“教训派文学观”，因为前者“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固然是文学之大害；后者则会“使文学之树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长成”，同样不能容忍。因而他把“真挚的情绪”视为创作的根本，说有了它，作品既能给人以娱悦、给人以美感，又能使读者“自然的会受他的同化，受他的感动”^⑤。叶圣陶同样看重作者“浓厚的感情”、“真诚的态度”、“创作的冲动”，说这些是文艺的特质、灵魂、生命，缺少了它们，“表现人生”的目的就无从谈起了^⑥。冰心也持相似的见解，她说，“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真’的文学”，主

① 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历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② 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

③ 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

④ 《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历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

⑤ 《新文学观的建设》。

⑥ 《文艺谈》（一——四）。

张创作必须“发挥个性，表现自己”^①。……这些作家要求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与真实的感情、真实的生活的统一。他们不仅彻底否定“载道”、“消闲”的陈腐观念，也扬弃了晚清梁启超等人将文学(小说)作为政治宣传和思想启蒙工具的急功近利的实用观点，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学观念的建设。

文学研究会作家对创作方法曾经进行过一番认真的理论探讨。沈雁冰认为，西方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几个文学思潮的更迭嬗变，“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因此他说，“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是现在最圆满的”。可以看出，这个论断带有明显的机械进化论色彩。但沈雁冰并没有停留在这个理论分析上面，他又进一步从实际出发，指出由于中国文学未曾经过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两个阶段，因而现在倡导新浪漫主义的条件尚不具备，又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充满了科学的精神，……对于纯任情感的旧浪漫主义，终觉不能满意”，所以，只有自然主义才是救治中国现代小说“游戏消闲的观念和不忠实的描写”这两大致命缺点的“对症药”^②，于是他大力提倡自然主义——现实主义。

文学思潮，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由于“五四”前后文化思想的开放，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等等西方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作品和理论主张，几乎同时被介绍进来，这时候它们对于中国新文学界，主要是具有创作方法上的意义，而失去了作为文学思潮的历史性的价值。

①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②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沈雁冰就是把自然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来看待、来提倡的。他对西方的自然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我们主要是吸取自然主义“客观描写”和“实地观察”这些“技术上的长处”^①、“科学的描写法”^②；而“自然主义专一揭破丑相而不开个希望之门给青年”这一点则不足取^③，因此他多次指出，对于自然主义不应该处处摹仿。由此可以看出，沈雁冰虽然有时把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混为一谈^④，但他真正赞赏的是写实主义而非自然主义。对人生、对文学持严肃的态度，进行真实的客观的描写，不受宗教、伦理、哲学上任何教条的束缚；作品内容充实，能反映出民族的特色、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不单纯追求丑恶现象的描写；要有“激动人心的积极性”^⑤——这就是沈雁冰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主要内容。他的现实主义主张代表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倾向，成为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志。

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倾向，在翻译方面也表现得很充分。这些作家对于翻译极为重视，其范围之广，涉及外国文学史、文艺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理论、作家评介、代表作品、文坛消息等等。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广，无其它社团可与之相比。他们的翻译是有计划、有选择的，一方面对于西方各文学思潮、流派进行系统的介绍，一方面对于东北欧、特别是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格

①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② 《“曹拉主义”的危险性》。

③ 《自然主义的论战》。

④ 沈雁冰曾在《答吕蒂南》中说：“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⑤ 参见《“写实主义小说之流弊”？》、《新文学者的责任与努力》、《文学与人生》。

外重视;《小说月报》所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特辑、《俄国文学研究》号外等,也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给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榜样,对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迅速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品,无论是对于一个作家,还是一个社团,以至一个文学运动,都是最重要、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在小说、散文、新诗、戏剧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创作成就,最充分地体现了他们共同的现实主义倾向。

作家们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其中小说创作,又尤以短篇小说创作,是文学研究会成就最突出的部门。)以及在理论、翻译等多方面的成就,使文学研究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影响最大的现实主义流派。人们常习惯地称之为“为人生的艺术派”或“人生派”。

三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镜子。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文学作品又是作家精神劳动的再创造的产品,是作家思想的结晶。因此,只有那些具备了本时代先进世界观的作家,才能够深刻地认识社会,进而在自己的作品里比较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面貌和本质来。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劳,莫过于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乃至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水平提升到了现代的高度。文学研究会的小说作者,或者是“五四”以前便已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或者是在“五四”启迪下觉醒了的

文学青年,他们年轻(几乎全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俊才),他们向往光明,都是新思想的热诚的信仰者和鼓吹者。先进的思想武装使他们看到整个世界的进步潮流,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状态。把自己的国家跟时代的潮流相比较,使他们痛苦,使他们愤怒。文学研究会作家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现实社会进行忠实地描写、勇敢地揭露、尖锐地批判的。

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短篇小说,如果仅就各个单篇而论,也许是细小的、微末的,无法与优秀的宏篇巨制相比拟。但是,恰如鲁迅所言,它们各自描写的乃是中国社会这个“大伽蓝”之“一雕阑一画础”,小虽小,细细看来,“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它们是各从某一侧面、某一部分来反映整个社会的^①。当我们把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数百篇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时候,就会为其丰富、生动、深刻的现实内容而赞叹不已了。它们是时代新人的强烈、真切的生活感受的写照,是新思想集团对于中国社会的严肃观察和深刻思考,是新文学家族对现实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艺术概括。这些作品构成了一轴现代生活多姿多彩的现实主义画卷,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历史认识价值。

文学研究会作家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

现实主义思潮在西方文学史上出现,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它的历史功绩也主要在于此。当文学研究会作家以现实主义方法来反映中国现代生活的时候,他

^①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们的思想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们了，而描写的对象（中国社会）却比当年西方作家笔下的社会更黑暗、更落后。文学研究会作家是站在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实的，因而他们是勇敢无畏的批判者；他们又多出身于跟下层人民非常接近的小资产阶级，有些还是从农村或小城镇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苦难，因而他们能够从底层来揭露社会的罪恶，成为忠实的描写者。于是，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众多的下层人物形象。

叶圣陶在《苦菜》里面写了一个叫福堂的农民。作品中对福堂的耕作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不用尺量，只将耙轻轻地爬别，自然成了极正确的长方形的畦；而且各个畦的面积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潭槌来，在畦上打成一个一个的潭，距离也无不相等，每畦恰是一百个。……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也会跟作者一样，对福堂油然而生钦羡的情绪，从他的劳动获得美的享受，禁不住喊出“劳工神圣”的话来。然而福堂却对自己的劳动创造缺乏热情，他总是“懒懒地”，总带着忧郁的神情，还说“我夜夜做梦，梦我不种田了。真有这一天，我才乐呢。”劳动，本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可是福堂辛勤、出色的劳动却无法维持他最起码的生活，连亲生的孩子都养不起，送人的送人夭折的夭折，六个孩子失去了五个。于是，劳动对于他，便成为可厌的“被迫的强制劳动”、“异化的、外在的劳动”了^①。福堂怎能不时刻向往着逃避它、摆脱它呢？

在作者笔下，农民福堂有智慧、有技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应当享受人的权利、得到人的待遇的人；在现实里，他却是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个受苦受难，过着非人生活的人！

庐隐的《一封信》里面，那个十二岁就随母亲离家出来帮佣，十五岁被债主抢去做妾，受尽折磨而死的聪明伶俐的农家女儿梅生；王思玷的《偏枯》中，身体瘫痪，眼睁睁看着大儿去当和尚、小儿被人抱走、妻子给人家做女仆，而痛不欲生的农民刘四；许杰的《改嫁》里的那个丈夫新死，婆母逼迫改嫁（实际是卖她还债）的启清嫂；徐玉诺《一只破鞋》里死于战乱的善良无辜的农民海叔叔；以及冰心的《超人》、庐隐的《海滨故人》、王以仁的《流浪》等小说里面那些苦闷、徬徨、穷困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跟福堂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人。

作家们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怀着博爱精神，来写自己的主人公的。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哀伤，而愤慨，为他们的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向社会抗争。作品里的这些卑微的“小人物”，再也不是古典小说、戏曲中被嘲弄的丑角或作为陪衬的道具式的角色了。他们是真正的“人”，是中国小说史上出现的“新人”。恩格斯把现实主义的基本含义解释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换句话说，人民群众已经成为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一环境中的主要角色。文学研究会小说中这些新的典型人物的出现，正是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因而也是中国文学真正进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题材并不能决定作品的主题思想，但是从一个作家所选择的题材，往往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而一个文学流派在选择题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思想与艺术的倾向来。文学研究会作家主张“客观”、“真实”地表现人生。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